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故训方言：清代考据学中的时间与空间

何映天

［摘要］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涉及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既体现为古音韵古文字的方法突破，亦涉及跨族群多语文的地域拓展。本文首先考察清代《方言》学传统中方音与古音、方言用法与经典训释间的对应关系，随后将考察范围推广至“同文”视野下的各方域语言，通过对宫廷多语文典籍特别是其中对音关系的梳理，进一步探讨跨语言考证中的时空关联。本文指出，联结方域的“对音系统”与沟通今古的“古音系统”在方法论、认识论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因声求义”的共同思路下，文本展现出可供精密考证的内在深度，这是时间与空间、经典传统与方域交流的共同产物。

[关键词] 考据学　方言学　同文　时空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6）－03－0066－015

一、引言：两种翻译

在撰写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佛学史稿》中，梁启超曾将“翻译”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内翻外”，即通常意义上跨越语际、沟通地域的翻译；另一类是“以今翻古”，即将过往语言译为时下语言，这一翻译形式可追溯至《史记·五帝本纪》对《尚书·尧典》的转译式引用。① 在民国初年西学词汇涌入、文言转向白话的双重背景下，这一整合空间性与时间性翻译的思考方式自有其时代特征。而在传统学术史上集中处理“以今翻古”问题的，则非乾嘉考据学莫属。梁启超在同期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便将这一翻译视角创造性地运用于“吴派”惠栋与“皖派”戴震两系的比较之上：

> 戴、段、二王之学，其所以特异于惠派者，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②

［收稿日期］ 2025−01−22
［作者简介］ 何映天（1991—　），男，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4，heyingtian@tsinghua.edu.cn
［基金项目］ 清华大学水木学者博士后—文科高等研究专项（2023SM209）阶段性成果。

① 梁启超：《中国佛学史稿》，《梁启超全集》第10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75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集，第245页。

将“吴派”与“皖派”分别视为借助译人与通晓原文的解经者，确实形象地抓住了二者的差异。而这一类比亦促使我们追问：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将小学训诂视为一种翻译行为？这一视角对于理解考据学在清代语言文字世界中的位置又有何助益？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王朝在对多元族群的治理过程中，跨越满、汉、蒙、藏、回等语言所形成的多语文政治文化与教化传统，始终是维系统治的重要纽带。如果说惠、戴诸人的考证著述代表了清代学者在“时间性翻译”上的成就，那么在同期的“空间性翻译”上，则首推清廷在“同文之治”理念下所编纂的一系列翻译与多语文著作。[①] 特别是在乾隆朝中后期，“考证”与“同文”作为语言文字领域的两大宗，一并步入高潮，而处于同一学术时空之下。由于学科背景与问题意识的差异，当代学者在对二者进行历史梳理时，往往将其置于不同学术脉络之下。“考证”所涉及的音韵文字、金石校勘诸学，通常被纳入经学与思想史的传统之中，而“同文”所涵盖的语言译介与政治教化等问题，则更多采用边疆史、区域史等分析视角。[②] 对于二者间可能存在内在联系，学界则较少论及。近年来，在草木鸟兽、水文舆地等专门知识领域，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多语言传统与经典考证间的关系。[③] 但有关“考证”与“同文”在语言文字这一核心领域乃至更广泛认识论层面的系统关联，则未见专文讨论，而梁启超有关“两种翻译”的论述，恰恰为考察这一关联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切入点。

如果“考证”与“同文”分属同一问题的两种形式，如何考察二者间可能存在的时空关联？王东杰在分析国语运动时曾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方言”是民族主义思潮与语言学分类的产物，而自西汉扬雄《方言》以降，依托于“天下”观的传统“方言”概念则宽泛得多，足以涵盖各族群的方域性语言。[④] 于是方言学传统既涉及小学训诂的经典文本，亦有关多族群语言的流变交融，是关联“考证”与“同文”两领域的绝佳材料。本文即拟从清代方言学传统的时空属性入手，梳理基于古音的经典考证与基于对音的跨语言考证间的对转关系，进而展现其背后共通的认识论指向。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证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考察清代《方言》学著作，揭示在具体考证问题中经典训释与方言用法间的对应关系，并以福建籍作品为例，指出这一关系在古音与方音的系统比较中同样存在。第二部分则将考察范围由汉地方言推广至“同文”视野下的方域语言，通过对一系列多语文作品特别是其中对音关系的梳理，进一步探讨跨语言考证中的时空关系，并揭示“古音”训释与“对音”通译在方法论与认识论层面的内在一致性。

二、《方言》传统中的时间与空间

谈到早期中国的方言学传统，首推扬雄《方言》。依其自述，为编纂此书，他曾二十余年如一日，向各地前来京师的“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征询异语。[⑤] 不过正如当代学者所见，《方言》

---

① 马子木、乌云毕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乌云毕力格：《〈西域同文志〉文献学诸问题》，乌云毕力格、张闶：《同文之盛：〈西域同文志〉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第 5–9 页。

② Ori Sela, *China's Philological Turn: Scholars, Textualism, and the Dao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林士铉：《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化》，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9 年；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③ 马子木：《清朝西进与 17–18 世纪士人的地理知识世界》，《中华文史论丛》2018 年第 3 期；He Bian and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The Manchu Mirrors and the Language of Natural History in High Qi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5.

④ 王东杰：《“汉语是一种语言”：中国现代国语运动与汉语“方言”的成立》，《学术月刊》2015 年第 11 期。

⑤ 华学诚汇证：《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037 页。

一书并非西汉各地语言的简单汇总。如以开篇第一条为例："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①] 濮之珍指出，此条目实际可分为"党、晓、哲，知也"与"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两部分。前一部分称为"雅诂"，列举一系列同义语词予以释义，体例与《尔雅》相近；后一部分称为"方言"，是对各语词流通地域的具体记载。通观全书，由于存在大量只包含第一部分，或两部分所载语词不一致的条目，可推知"方言"部分是语言调查的结果，较多地代表了汉代方言的共时性分布，而"雅诂"部分则是依据《尔雅》等文献事先拟定的"方言调查提纲"，因而也保留了来自先秦时期的历时性语料内容。[②] 于是《方言》一书的编纂体例本身，即已暗含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维度。同时代的刘歆在致书扬雄时，即将其事业形容为"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③] 宋代以降，该书更以《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全称行世。尽管这一全名似为后世学者根据二人书信附会而成，但将"绝代"与"别国"并举，却精当地概括了该书的时空尺度。[④]

尽管如此，《方言》学的时空属性一度并未得到重视。如明刻《方言》载南宋李孟传跋，仅提及此书"多识奇字"，最为奇古；同书附明代李珏跋，亦以"爱其奇，而惜其不传"收束，以点明重新刊刻的原委。[⑤] 可见《方言》一度被视为文字古奥的"奇书"，其训诂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识。这一情形直至 18 世纪后半叶才得到根本改观。其中戴震积二十年之功疏证《方言》，并依《永乐大典》校勘坊本，订补错讹三百余字，居功至伟。[⑥] 同期及稍后校正《方言》者，尚有卢文弨、丁杰、王念孙诸家；依《方言》体例，自早期文献中摘录地方性语汇增补其书者，有杭世骏《续方言》一书；而笺注《方言》者，则以钱绎《方言笺疏》最为完备。正是在这一时期，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到蕴含在《方言》学时空中的重要训诂意义。如与戴震同期、开一代考据之风的朱筠，曾欲仿照《方言》撰写《方音》一书。尽管这一计划因其早逝而未果，但撰述思路却保留在其子锡庚的《笥河文集序》中：

> 学者不通古音，无以远稽古训。故刘熙《释名》，因声求诂；扬子《方言》，遍历𬨎轩。可以异域之言，而证近正之训，亦可以殊方之声，以推往古之音，庶几周、秦、汉、魏音声递变之故可以通。欲仿《方言》而撰《方音》。[⑦]

自明末清初陈第、顾炎武以降，"古音"与"今音"的流变差异渐趋明晰。乾嘉学者通过日益精密的古音分部、因声求义的方法突破，为考据学引入了前所未彰的时间维度。[⑧] 古音分部的文献基础，在于早期韵文与假借字例，而朱筠以《方言》为参照，提出"殊方之声"与"往古之音"的对应关系，便在经典文本之外指明了一条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异域之言"印证古训的新路径。

有清一代，推行这一思路最为系统彻底者，当属清末章太炎《新方言》（1908）一书。书前自序就方音与古音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释：

> 余少窥扬、许之学，好尚论古文，于方言未遑暇也。中更忧虑，悲文献之衰微，诸夏昆族

---

① 华学诚汇证：《扬雄方言校释汇证》，第 9 页。

② 濮之珍：《方言与尔雅的关系》，《学术月刊》1957 年第 12 期。亦参见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14–115 页；汪启明、张蓓：《基于文本与实证分析的扬雄〈方言〉再认识》，《语言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③ 华学诚汇证：《扬雄方言校释汇证》，第 1033 页。

④ 有关《方言》全名与二人书信的关系，参见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第 69–70 页。

⑤ 扬雄：《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李孟传、李珏跋，《历代方言俗语谣谚文献辑刊》第 1 册，广陵书社，2020 年，第 348、351 页。

⑥ 戴震：《方言疏证》序，《戴震全书》第 3 册，黄山书社，2010 年，第 6–7 页。

⑦ 张俊岭：《朱筠年谱新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15 页。

⑧ 王力：《汉语音韵学》，《王力全集》第 10 册，中华书局，2014 年，第四章；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第三章。

之不宁壹，略紬殊语，征之古音，稍稍得其鰓理。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有通语既用今音，一乡一州犹不违《唐韵》者……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①]

全书收集语例 370 余条，即以当日流行之方言，印证《说文》等早期文献之古训，并指明二者间的音韵关联。所涉地域虽以章氏生活的江浙一带为多，但亦涵盖湖广、四川、山东等更为广阔的区域。且如其弟子汪东所言，章氏本意，乃欲以《新方言》作为更大规模收集工作的基础，使四方好学之士“本此条例，各就其方土语言专力研讨，然后荟为一编”。[②] 如汪氏作《吴语》、邬心普作《赣方言考》等，即直接受到《新方言》的影响。[③]

尽管这一通盘计划在思路上颇有创见，至于学者汇集自己熟习的一地乡音以印证古语，却为清代所多有。这一训诂传统，实可追溯至清初考据学先驱毛奇龄的《越语肯綮录》。在这一短篇中，作者列举了三十六条来自家乡绍兴的方言用法。依自序记载，此篇本系作者考察《切韵》的副产物，用以辨明本地方言中“呼其音而不得其文者”的用法。[④] 然而一旦在二者间建立联系，方言也就同时有了证古的效力，且在部分条目中，毛氏所举证者亦超出韵书所限：

山阴西乡以对扯物裂曰“斯”，初不晓其字，今知即支韵“斯”字也。《说文》注“斯”为“析”,《尔雅》注“斯”为“离”，故《诗》“斧以斯之”，即“析薪”之义。而史称“厮养”，即“斯役”;《易》旅象初六“斯其所取灾”，王辅嗣注为“斯贱之役”，盖“厮”亦以“斯”得名，谓其能析薪，为灶下养也。惜后昧此义，而但闻俗音，从无行文见此字者，亦憾事矣。又瓮破为“甏”，音“斯”，即“斯之”之义。[⑤]

此条自支韵“斯”字出发，以绍兴方言中的有声无字的撕物之“斯”，印证《说文》《尔雅》《毛诗》古训中的析物之“斯”，并由此旁及厮、甏二字词源，以典型的小学考证形式，展现出方言与故训间的时空对应关系，及其中所蕴含的训诂价值。

乾嘉以降，随着《方言》学的复兴，类似的方言证古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体量上均有显著增加。较有代表性者，如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张澍《秦音》、刘家谋《操风琐录》、谢章铤《说文闽音通》、张慎仪《蜀方言》、王树枏《畿辅方言》诸作，覆盖了多个地区的方言情形。其中《吴下方言考》十二卷，历时三十年成书，收录吴中地区方言词汇达九百九十三条，广征早期文献加以印证。[⑥] 在此过程中，胡氏特别注意到方言与古语间复杂的音义对应关系：“或用其义而不用其音，或用其音而不用其义，要皆本以六书，参之群籍。”[⑦] 如卷六“焜”字一条：

焜 吴音媒。

扬子《方言》：“煤，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焜，火也。”许氏《说文》：“焜，火也。从火，尾声。”案：焜，媒也，引火之物也，从火，尾声。火已尾末将熄，则继火尾者当用焜也。吴中卷纸引火曰“焜头”，则以彼火之尾，实此火之首也。[⑧]

此处以吴地引火之“焜头”，印证《方言》《说文》“焜，火也”之古训，并由此论及该字词源。考郭璞注《方言》、陆德明释《毛诗》，皆以“焜”字音“毁”，而此条注明吴音为“媒”，同韵

① 章太炎：《新方言》序，《章太炎全集》第 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4–5 页。
② 汪东：《吴语》，《章太炎全集》第 4 册，第 172 页。
③ 汪东：《吴语》，《章太炎全集》第 4 册，第 161 页；邬心普：《赣方言考》序，民国二十五年稿本，南京图书馆藏，第 1a 页。
④ 毛奇龄：《越语肯綮录》，《毛西河先生全集》第 73 册，嘉庆萧山陆凝瑞堂刻本，第 1a 页。
⑤ 毛奇龄：《越语肯綮录》，《毛西河先生全集》第 73 册，第 1a–b 页。
⑥ 徐复、唐文：《〈吴下方言考〉引言》，胡文英著，徐复校议：《吴下方言考校议》，凤凰出版社，2012 年，第 1 页。
⑦ 胡文英著，徐复校议：《吴下方言考校议》凡例，第 2 页。
⑧ 胡文英著，徐复校议：《吴下方言考校议》卷 6，第 105 页。

而不同声，正属“用其义而不用其音”之例。[①] 于是方言与古语，义训相合而音读相转，使二者间的时空关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而具有了“审音勘同”的意味。又如谢章铤《说文闽音通》首条论“斯”字，全文征引毛奇龄《越语肯綮录》中的对应条目，并附按语云：“闽语凡小物不用刀劈而手扯碎之，亦谓之‘斯’。读‘斯’如‘诗’，则语音轻重之不同耳。”[②] 不仅印证了毛说中的时空关联，还通过音转关系将其推至更广阔的地理空间。

当然，方音证古作为一种训诂方法，其应用并不限于《方言》学的专门之作。如乾嘉时期的考据大家程瑶田在名作《九谷考》中，即曾广泛搜集山西、河北、山东一带黍米的俗称，以印证早期文献中“黍”“稷”分为二物的重要结论。[③] 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亦多以山东乡音印证古训。如“毗刘，暴乐也”一条，在广征《毛诗》《说文》《汉书》《文选》等文献，将两词与剥落、萚落、仳离、披离、觱篥、必栗等一系列连绵字相联系后，又以方音证据加以补充——“今登莱间人，凡果实及木叶陊落，谓之‘毗刘杷拉’。‘杷拉’亦即‘暴乐’之声转。”[④] 于是登莱方言与古籍训释，便一同成为构建连绵字系的语料。

方音证古之法亦不限于个案推断，对于古今音系之变化，也能有总体性的把握。如福建方言保留了较多古音，自晚明陈第首倡古音之学以来，素为音韵重镇。安溪李光地原本不谙此道，至入京为庶吉士，得顾炎武指点，始对当日的古音学方法有所了解。[⑤] 李氏晚年的音韵学工作，首推在康熙帝授意下，与其高徒王兰生完成的《音韵阐微》一书。其“凡例”部分阐释了李氏有关古今音差异的重要观点：“知、彻、澄三母，古音与端、透、定相近，今音与照、穿、床相近。”[⑥] 钱大昕“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一说，论知、彻、澄三母，古音与端、透、定无异，乃古声纽学的重要发明，而李光地在半个多世纪前即已得其先声。[⑦] 然而在该问题上，李氏并未遵循顾炎武的方法，据周秦之文“质验字傍”。[⑧] 其《南北方音及古今字音之异》一文云：“知、彻、澄、娘之为舌音，今存者娘字耳。余三字则皆入齿音，不知自何时而变，惟闽广人则尚有之。”[⑨] 可见这一发现的关键所在，实为李光地的福建乡音。

又如侯官人刘家谋于道光年间撰《操风琐录》四卷，堪称闽音证古的典范之作。古音之学至于此时，已大行于学林，刘氏遂有以福建方音系统印证古音结论之举。该书首卷列举“匪如彼”“长如党”等闽音读法各数十例，以印证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两结论。[⑩] 又如首卷开篇，刘氏自“日为半舌齿字，或从舌，或从齿”的观察出发，先举闽音日母读如舌音者十一例（如“汝读女”“仁呼宁”），并与早期文献互证，又举泥日两切、娘日两切读如舌音者十二例（如猱、獳等字）。二者皆用以印证李元《音切谱》中“泥、娘与日三母偏傍多有相谐者”的论断。[⑪] 半世纪后，章太炎作《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乃古声纽学另一关键发明。[⑫] 刘家谋虽无归并上古声纽之意，但其所见音读关系既为相似，所举语例亦多与章氏相合，足见方言对古音研究的助益之力。

---

① 周祖谟：《方言校笺》，中华书局，1993 年，第 61 页；《毛诗传笺》卷 1，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4 页。

② 谢章铤：《说文闽音通》卷 1，《历代方言俗语谣谚文献辑刊》第 19 册，第 296 页。

③ 程瑶田：《九谷考》，《程瑶田全集》第 3 册，黄山书社，2008 年，第 28–29 页。

④ 郝懿行：《尔雅义疏》上之又一，《郝懿行集》第 4 册，齐鲁书社，2010 年，第 2866–2867 页。

⑤ 李光地：《榕村全书》第 9 册《顾宁人小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62 页。

⑥ 《御定音韵阐微》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4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2 页。该观点亦见于李光地：《榕村全书》第 9 册《覆发阅王兰生所纂韵书札子》，第 192 页。

⑦ 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7 册《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凤凰出版社，2016 年，第 160–166 页。

⑧ 李光地：《榕村全书》第 9 册《顾宁人小传》，第 262 页。

⑨ 李光地：《榕村全书》第 8 册，第 513 页。

⑩ 刘家谋：《操风琐录》卷 1，《刘家谋全集汇编》第 3 册，龙文出版社，2012 年，第 831–857 页。

⑪ 刘家谋：《操风琐录》卷 1，《刘家谋全集汇编》第 3 册，第 819–823 页。

⑫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 5 册，第 25–27 页。

闽音与古音的密切关联，为福建考据学者营造了一种特别的地域自豪感。刘家谋挚友、长乐人谢章铤在《操风琐录》序言中不无骄傲地写道：“音韵之学，吾闽最精。吴才老、陈一斋皆闽产也。国初安溪相国，尤为神解，《钦定音韵阐微》半出其手。”① 吴才老为宋人吴棫，首倡古韵分部之说；陈一斋即明人陈第，为古音学的开山祖师；安溪相国即李光地。于是古音学的早期历史，一变而为闽人的传承谱系。刘家谋在紧随其后的自序中亦表达了类似的传承观点，并将闽音提升至天然之音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度：“闽处天下之东南，于卦为巽，于象为风。其于籁也，纯乎天者也。”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谢章铤在所撰序言末尾的调侃：“昔杭世骏游闽，箸《榕城诗话》，讥闽人为鸟音禽呼。试以此示之，当爽然自失也！”③ 闽音听似“鸟音禽呼”，却直追上古，是比当日雅音更雅的“纯乎天者”。通过与古音的关联，福建学者成功完成了“方音”与“雅音”间地理等级秩序的翻转。

对于现代学者而言，清代方言学所勾勒的时间与空间维度并不陌生。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以降的现代语言学中，“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正是基本的研究范畴。④ 但就时空转换的关系而论，清代方言学尚有其独特之处。王东杰曾援引民国语言学家沈兼士的观察，指出传统方言学以古书为中心，注重“纵面”的证古，而现代方言学以语言调查为中心，注重“横面”的通今，颇具洞见。⑤ 其中要义，则可做进一步探求。钟雨柔在分析民国方言学研究时曾指出，在“国语运动”背景下的方言调查，其本质是一种指向他者的时间空间化：

> 时间的“他者”一旦被放置在时间轴的彼端成为原始古早的象征，那么观察、描述、分析他者的我或者我们就自动地站在时间轴的此端，被许可成为现代的代表。六次方言调查绘制出的方言地图，无论是从语言学还是人类学的角度看，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查、理解、控制他者的作用。⑥

可见无论在清代还是民国，都涉及方言的时间性标记。其差异不在时间轴的有无，而在其方向与意义。在清代方言学自“别国方言”向“绝代异语”置换中，“别国”固然是地理空间的边缘，但这一边缘却因保留了黄金时代的语言而在训诂系统中获得不亚于中心的地位，使系统整体呈现出时空变换的多元性。民国方言学则因其现代性视角调转了时间轴的方向，使当下与现代、古早与原始相连。调转的时间阻断了由风至雅的变换，使空间性边缘同时成为时间性边缘。而作为双重边缘的方音异语，也就不免断裂为语言凝视中的他者。

三、从“方言”到“同文”

“国语运动”背景下的民国方言学，是民族主义与现代语言分类的特殊产物。清代的“方言”概念，则在此束缚之外。如王东杰所言，传统意义上的“方言”，既不受民族国家的疆域所限，亦不以语言分化的同源性为标准，而是一种在“天下观”所孕育的空间与政治秩序之下普遍适用的方域性语言范畴。⑦ 如晚清为培养翻译人才在上海设立的“广方言馆”，其命名即是这一用法的延续。至于盛清“大一统”格局下的“方言”规模，则可由龚自珍《拟上今方言表》一文窥见端倪：

---

① 刘家谋：《操风琐录》卷 1，《刘家谋全集汇编》第 3 册，第 815 页。
② 刘家谋：《操风琐录》卷 1，《刘家谋全集汇编》第 3 册，第 817 页。
③ 刘家谋：《操风琐录》卷 1，《刘家谋全集汇编》第 3 册，第 815 页。
④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79−100.
⑤ 王东杰：《“汉语是一种语言”：中国现代国语运动与汉语“方言”的成立》，《学术月刊》2015 年第 11 期。
⑥ 钟雨柔：《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 年，第 94 页。
⑦ 王东杰：《“汉语是一种语言”：中国现代国语运动与汉语“方言”的成立》，《学术月刊》2015 年第 11 期。

臣在京师，造《今方言书》，徂江之南，逾岁而成。首满洲，尊王也；胪十八行省，大一统也；终流求、高丽、蒙古、喀尔喀，示王者无外也。①

可见“方言”规模所致，正与王朝声教所及相仿佛。尽管该书未见成稿流传，但在今存《蒙古声类表序》中，龚氏曾广泛统计各方域语言所包含的音声种类，如满语共计 1240 字，蒙古语 1410 字、回语 1015 字、藏语 434 字等，知其于方域语言确有心得，所言《今方言书》，并非空穴来风。② 如果在汉语方言中可以观察到广泛的时空对应关系，而清代对“方言”的定义又不为现代语言分类所限，那么在“大一统”格局下更为广阔的“方言”范围里，是否也能观察到类似的时空联系？换言之，对于清代多语言视域下更具原初意义的“空间性翻译”，是否也可观察到与“时间性翻译”的内在一致性？

在 18 世纪多语言考证的脉络下，这一问题可从语言学、方法论与认识论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具体而言，其一是基于语言共通性或语系之内的相似性而展现的时空关联。其二是清廷为使汉字准确表音而发展的精密对音系统，与考证学中的精密古音系统在方法论上的联系。其三是在词汇与义项这一更为抽象的关系上，共时性与历时性语言在认识论层面的一致性。本部分将从以上三个方面依次展开论述。

（一）语言共通性下的时空联系

清初学者刘献廷曾撰有《新韵谱》一书，今佚。全祖望《鲒埼亭集》称述其学，言“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总结为韵父三十、韵母二十二、横转各五，以求尽摄“万有不齐之声”。③ 魏宁坦（Nathan Vedal）指出，对晚明以降的音韵学者而言，拼音文字已非陌生之事。在宇宙论式的音韵学框架下，远至拉丁、天竺，近自蒙古、满洲的一切语料音素，皆可纳入其中。④《新韵谱》无疑是这一思路的延续，所参考的文字范围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刘氏通过梳理诸方语料所构建的，乃是一个试图涵括各种发声可能的音韵总表。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维度的静态系统，并未涉及其中的流转关系。

在《音韵阐微》的编纂中，对类似语料的运用方式即已发生变化。王兰生曾在一封书信中，向恩师李光地汇报自己奉康熙帝之命在跨语言音韵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又蒙恩命，考高丽、喇嘛、回回诸韵。其与等韵最近者，惟喇嘛韵，可见字母之说，原来自梵僧也。回回韵以埃、衣、乌三韵为首，亦得生字之本也。惟四呼之法，向来总不得其根，皇上谓其根出自高丽韵。及观其字，果以噶加、歌皆、锅觉、各基、姑居等字为首，与四呼之说极合，实四呼之所自来也。⑤

康熙帝“于声音之学究心二十余年”，对诸方文字多有心得。⑥ 奉其旨意，王兰生遍考高丽、喇嘛、回回诸韵，所得有三。其一是喇嘛韵与等韵最为接近，可证藏文字母与中古声系的渊源关系。此论在乾隆朝《同文韵统》一书中将有进一步阐释，详见下文。其二是回回韵以埃、衣、乌等元音字母为首。这与当日有关《音韵阐微》韵谱体例的讨论直接相关。依其师李光地之见，唐韵以东、冬、江诸韵部排列，不及满文字头之以 a、e、i 等元音起首为优：“盖古今韵部，惟本朝十二字头，为得天地之元声，符三代之古法。”⑦ 回回韵亦以元音起首，益可征此为三代自然

①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308 页。

② 此处之“字”，相当于后世的“音节”。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 216–220 页。

③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 28《刘继庄传》，嘉庆九年刻本，第 11b–12b 页。

④ Nathan Vedal, *The Culture of Language in Ming China: Sound, Script,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chapter 2.

⑤ 王兰生：《交河集》卷 5《再启安溪相国》，道光十六年刻本，第 38a–b 页。

⑥ 黄雪晴：《〈音韵阐微〉的音系与反切改良》，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16–17 页。

⑦ 李光地：《榕村全书》第 9 册《覆发阅韵谱式样札子》，第 188 页。

之法，故云“亦得生字之本”。这是基于语言共通性的语源学探索。其三是韵书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的来源问题，康熙帝指点王氏自高丽韵中寻找答案。

王兰生有关《音韵阐微》的韵学见解，多保存于刘绍攽《学韵纪要》（1740）之中。刘氏尝从王兰生学韵，此书即为纂辑师说而成，且曾亲经王氏裁定。[①] 是书于卷二《切韵谱》后，恰列有《高丽字音》《回回字音》《喇嘛字音》三表。其中回回韵以“挨”“夷”“吾”三字起首，高丽字以“歌巴切”（ga）“驾”（gya）、“歌”（geo）“介”（gyeo）、“锅”（go）“觉”（gyo）、“姑”（gu）“居”（gyu）、“哥恩切”（geu）“基”（gi）“歌巴切深喉声”十一字为首列（图 1），正与信中记音相合。[②] 知以上三表，即反映了王氏奉旨查韵时的参考语料。朝鲜语 a、eo 为开口音，ya、yeo 为齐齿音；o、u 均开口甚小，音近合口，二者与介音 y 相配，音近撮口。于是起首八音两两成对，确如其汉字对音所示，体现出“与四呼之说极合”的特点。当然，严格而言，这一观察并不足以支持高丽韵“实四呼之所自来”的单向性结论。但王氏考察诸方文字，皆用以印证汉语音韵中的历史现象，其中所构建的时空脉络，与刘献廷《新韵谱》的宇宙论框架已有本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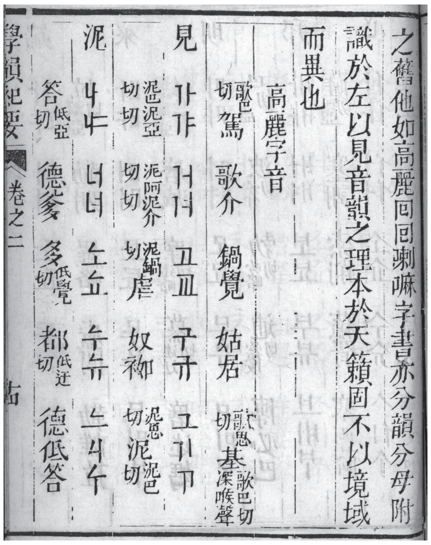
之舊他如高麗回回喇嘛字書亦分韻分母附
識於左以見音韻之理本於天籟固不以境域
而異也
高麗字音
歌巴切 駕 歌 介 鍋 覺 姑 居 歌恩切 基 歌巴切深喉聲
見 가 갸 거 겨 고 교 구 규 그 기 ᄀᆞ
泥巴切 泥亞切 泥阿切 泥介切 泥鍋切 虐 奴 衂 泥恩切 泥 泥巴切
泥 나 냐 너 녀 노 뇨 누 뉴 느 니 ᄂᆞ
答 低亞切 德爹 多 低覺切 都 低迂切 德 低 答
學韻紀要 卷之二

图 1　刘绍攽《学韵纪要》卷 2《高丽字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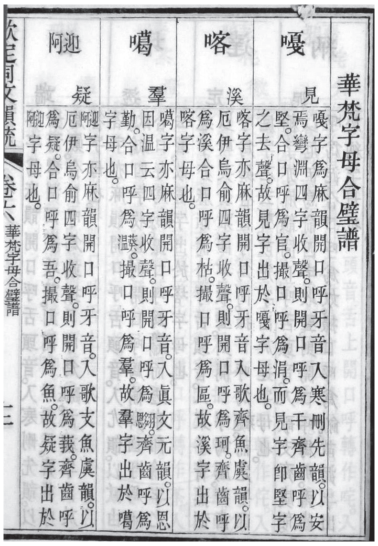
華梵字母合璧譜
嘎 見
嘎字爲麻韻開口呼牙音入寒刪先韻以安焉彎淵四字收聲則開口呼爲干齊齒呼爲堅合口呼爲官撮口呼爲涓而見字即堅字之去聲故見字出於嘎字母也
喀 溪
喀字亦麻韻開口呼牙音入歌齊魚虞韻以厄伊烏俞四字收聲則開口呼爲珂齊齒呼爲溪合口呼爲枯撮口呼爲區故溪字出於喀字母也
噶 羣
噶字亦麻韻開口呼牙音入眞文元韻以恩因溫云四字收聲則開口呼爲[illegible]齊齒呼爲勤合口呼爲[illegible]撮口呼爲羣故羣字出於噶字母也
迦阿 疑
迦阿字亦麻韻開口呼牙音入歌支魚虞韻以厄伊烏俞四字收聲則開口呼爲莪齊齒呼爲疑合口呼爲吾撮口呼爲魚故疑字出於迦阿字母也
欽定同文韻統 卷六 華梵字母合璧譜

图 2 《钦定同文韵统》卷 6《华梵字母合璧谱》

18 世纪有关多语言时空关联的经典作品，首推《钦定同文韵统》（1750）一书。是书之作，意在使佛门信众诵读汉文经咒时，能“依照天竺本韵，持颂无讹”。[③] 所谓“天竺本韵”，实际主要处理的是汉藏对音关系。该书在系统列举藏文各音节组合的汉字反切后，“取梵音三十六字，为华音字母所从出者，列于上，而以华言列于下，合为一谱”。[④] 如图 2 所示，“梵音三十六字”，即嘎（ka）喀（kha）噶（ga）迦阿（nga）[⑤]、答（ta）塔（tha）达（da）纳（na）等反映藏文字母实际发音的对音汉字；“华音字母”，则为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等宋人三十六字母。对音既已确定，通过转换韵部，即可构建起“梵音”与“华音”的对应关系。以“答”（ta）字为例：

“答”字为麻韵，开口呼，舌头音。入寒、删、先韵，以安、焉、弯、渊四字收声，则开

① 刘绍攽：《学韵纪要》自序，光绪覆刻乾隆五年本，第 1a–2b 页。

② “歌巴切深喉声”，即 ᄀᆞ，其元音在现代韩语中已不再使用。刘绍攽：《学韵纪要》卷 2，第 14a 页，第 17a–b 页。

③ 《钦定同文韵统》卷 1《天竺字母说》，嘉庆十五年武英殿刻本，第 3b 页。

④ 《钦定同文韵统》卷 6《华梵字母合璧说》，第 4a 页。

⑤ 有关将反切两字合为一字的对音记法，详见本部分第二节。

口呼为“丹”，齐齿呼为“颠”，合口呼为“端”，撮口呼为“低渊”。故“端”字出于“答”字母也。[①]

于是“答塔达纳”四字，即可与“端透定泥”相配；“嘎喀噶迦阿”四字，亦可与“见溪群疑”相配。以此类推，“按韵寻呼，按呼求字，则以梵字入于华韵，展转求之，无不吻合”。[②] 等韵字母之所出及其与梵音的对应关系，也就完成了证明。乾隆帝在事后曾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朕少时见等韵书，亦茫然弗悉其原委。及后习蒙古语、回语，又习唐古特语、番语，然后知汉音字母，即梵音之字母。而以国书枢纽其间，率可以通华梵之情，畅形声之奥。”[③] 多语言背景对于考察音韵学时空关联的帮助，于此可见一斑。如果说《音韵阐微》中的“天地元声”是在语言时空中对人类一般发音规律的探寻，那么《同文韵统》中的华梵对应则是佛教东传历史交流的具体结果。此后无论是戴震在《转语十二章序》中有关发音声限的讨论，还是钱大昕对华梵字母早期历史的梳理，均可视为乾嘉学者对此类语言共通性问题的探索。[④] 至晚清国门洞开，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更将四十二天竺字母、二十八天方字母、四十八日本字母、二十六西洋字母统一按喉、腭、齿、牙、唇五音分类，并以西洋字母（即英文拉丁字母）读音急缓之异，印证《春秋》“句吴”“於越”等词“急读为一音，缓读辄为二三音”的特点，亦属这一共通性脉络的进一步延展。[⑤]

（二）汉字对音的精确化

乾隆帝提及“以国书枢纽其间”，将满文视作汉藏对音的关键。尽管当日确有将满文作为通用表音记号的趋势，且在《同文韵统》首表《天竺字母谱》中，满文也的确出现在梵、藏字母与汉字对音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但满文对于构建精确汉字对音系统的重要性，实远逾以上表象。这一精确化过程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音素的准确记录，反切的直拼改良。

康熙五十八年（1719），武英殿奉旨以满字填写宋人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图，与李光地商榷。[⑥] 李氏很快发现因古今音韵变化所引发的问题：

古人有闭口音，乃今诗韵侵、覃、盐、咸四部，在满字则 am、em、im 一头是也。浙江、江西、闽、广间此音尚存，直隶及他省皆无之。邵子七声中后两行，即是侵、覃、盐、咸之韵，如对以京音，则与真、寒、删、先等相复，似应以 am、em、im 一头之字对之。[⑦]

等韵与今韵之异，对于当日的音韵学者并不陌生。此事之不同，乃在于这一音变的呈现形式。传统体系下，一字之韵母以其所属韵部的汉字名表示。如甲字属“覃”韵，乙字属“寒”韵。甲、乙的韵母差异，即体现为覃、寒二字的韵母差异。至于覃、寒差异何在，则并无明确规定。或以前者为“闭口音”，这对于来自福建、在乡音中尚有中古音保留的李光地自无须解释，但对于两韵业已合流的大多省份学者则乏直观。然而在将韵表转录为满文时，如以中古音书写，则须对两韵部的差异作出正面回应。由于满文依“字头”即韵尾归类，第四字头（-n）与第十二字头（-m）差别明确，因此熟识满文的李光地很自然地将闭口四部与“am、em、im 一头之字”相联系。于是借满文转写之力，对闭口韵尾的汉字记录突破了传统的反切形式，而直接以对音呈现出来。在同期编纂的《音韵阐微》中，类似方法亦被应用于对入声韵尾差异的辨析：

屋、沃、觉、药、陌、锡、职为一部……其音宜与十二字头之收声于“克”字者相对，以

① 《钦定同文韵统》卷 6《华梵字母合璧谱》，第 12b 页。
② 《钦定同文韵统》卷 6《华梵字母合璧后说》，第 41a–b 页。
③ 《钦定音韵述微》御制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40 册，第 854 页。
④ 戴震：《戴震全书》第 6 册，第 302–304 页；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9 册，第 256–257 页。
⑤ 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0 辑第 2 册，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692–696 页。
⑥ 《清圣祖实录》卷 286，康熙五十八年十月壬子。
⑦ 原文 am、em、im 以满文书写。李光地：《榕村全书》第 9 册《覆填写〈经世声音图〉满文札子》，第 182 页。

皆收声于鼻音也。质、物、月、曷、黠、屑为一部……其音宜与十二字头之收声于“忒”字者相对，以皆收声于舌齿也。缉、合、叶、洽为一部……其音宜与十二字头之收声于“卜”字者相对，以皆收声于唇音也。①

受满文字头启发，汉字入声的“-k”“-t”“-b”诸韵尾不仅得到精确分辨，还通过“克”“忒”“卜”等对音，为这一差异的直接记录提供了汉字形式。

若说到《音韵阐微》在汉字记音方面最为重要的突破，则莫过于反切的直拼式改良。这一点更是直接来源于满文对译汉字时所采用的“合声切法”。《音韵阐微》凡例甫一开篇，即将此明确交代：

世传切韵之书，其用法繁而取音难，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则用法简而取音易。如……牵字旧用苦坚切，今拟欺烟切；萧字旧用苏彫切，今拟西腰切。盖翻切之上一字定母，下一字定韵。今于上一字择其能生本音者，下一字择其能收本韵者，缓读之为二字，急读之即成一音。此法启自国书十二字头，括音韵之源流，握翻切之窍妙，简明易晓，乃前古所未有也。②

传统反切记音，仅求上字之声母、下字之韵母合于本字，余皆不论。《音韵阐微》改良之要，即在于将反切上字限定在“支、微、鱼、虞、歌、麻”等单元音阴声韵中，从中择取与本字等呼相同者，又使反切下字尽量择取“影、喻”等零声母字。③ 如“牵”字为齐齿呼，故上字取单元音无韵尾、同为齐齿呼的“欺”字，而下字取韵部相同、零声母的“烟”字，二者连读，即成“牵”音。由于满文双元音数量有限，在转写以 i、u、ü 为介音的汉字时，多以两音节合声而成，其法久已通行。如“牵”字满文，即以 ci-yan 二字合写，与《音韵阐微》中的新式反切如出一辙。④“凡例”以此法“启自国书十二字头”，可谓切中肯綮。

《同文韵统》所言“以国书枢纽其间”，正须在此意义上加以理解。书中汉字对音，吸收了音素记录与反切直拼两方面的进展，并进一步规范其体例。对于本字之下附带别音者，“即于本字下，将别音字细书，合为一字”；对于在汉字内有音无字者，则“将所切二字并书，合为一字……照国书合声切法，急读之即成一音”。⑤ 前者是对韵尾等音素作准确记录，后者则是以合声反切呈现单字所不具备的复杂音节。于是受满文启发而进行的对音改良，即借助特定的排版格式被确立下来。这便是上文中藏语字母 nga 记为“迎阿”，而“端”字的撮口呼（düan）记作“低渊”的缘故。这一对音体系在同期及稍后被系统运用于“四译馆”与“西洋馆”所编川藏滇桂、东南亚及欧洲诸方译语，即今日学界所称《华夷译语》丁种本，而得到更为广泛的检验。⑥ 如《弗喇安西雅语》收录法文译语两千余条，其中表示“北斗”大熊星座的“la grande ourse”一词，其对音作“拉 格喇昂特 乌呼斯”，对原词中的每一个音素都进行了相应记录。⑦ 通过小字细书与合字切音的特定格式，汉字记音已达到相当的精确程度，即便对于首尾皆为双辅音的复杂音节 grande，亦能游刃有余。⑧ 嗣后《西域同文志》（1765）、《增订清文鉴》（1771）等书，又对汉字

① 《御定音韵阐微》凡例，第 12 页。

② 《御定音韵阐微》凡例，第 9 页。

③ 黄雪晴：《〈音韵阐微〉的音系与反切改良》，第 21–24 页。

④ 汉字合声转写的规范形式，可参见《清汉对音字式・切音单字》，道光十六年武英殿刻本，第 47a–52a 页。

⑤ 《钦定同文韵统》卷 1《天竺字母后说》，第 9a 页。

⑥ 丁种本的编订，时在 1748—1761 年间。其编纂背景详见春花、李英、郭金芳：《清乾隆年编〈华夷译语〉述论》，《故宫学刊》2018 年第 1 期。

⑦ 张荣主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第 14 册，故宫出版社，2017 年，第 31 页。

⑧ 自明初设立“四夷馆”以降，“译语”的编订已有悠久历史。在《华夷译语》丁种本中，亦收录部分由地方官员编写、以传统方式记音的方域语汇。如《川番译语》中，“藏经”bka’’gyur 作“甘菊”，“目录”kar chag 作“噶儿岔”。在清宫“四译馆”编订的《西番译语》中，两词则记作“嘎 基俞呼”与“嘎呼 察克”，精确性的提升，可谓一目了然。张荣主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第 2 册，第 110 页；第 3 册，第 322–323 页。

对音进行了“三合切音”式的注音拆解，以进一步明确发音细节。如《西域同文志》载罗布泊“lob noor”一条，汉文名作“罗布淖尔”，此为新式对音；该书复将其按音位依次拆解，得“罗鄂补 诺鄂傲呼”，此即“三合切音”。[①]“罗鄂”连读，即成罗；“诺鄂傲”连读，即成“淖”，其联缀之法，正以合声式的改良反切为基础。在“三合切音”中，所用汉字组合得到全面规范，达到与满文音节一一对应的程度。[②] 于是但凡能以满文标音的译语，皆可找到与之相应的“三合切音”，而将“三合切音”连读拼出，即可求得汉字对音。[③] 至此，汉字全面吸收了满文作为拼音文字在记音与直拼等方面的优势，构建起与之具有同等准确性的精密对音体系。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④] 自顾炎武提出古韵分部之说，小学诸家先后相继，以日益精密的古音体系，极大促进了乾嘉考证的发展。上述对音体系的精密化，亦能在方域译语的考证上收类似之功。这首先体现在译名的订正方面。如《西域同文志》开篇“bar kul”一条，对音作“巴尔库勒”。是书“凡例”提到，旧地名中多有“沿习虽久，而实非本音”者，即以此条为例，指出该地习称“巴里坤”，而“准以国书，其失较然可见”，故据而改之。[⑤] 此类译名，在《西域图志》《河源纪略》等嗣后成书的钦定西域类作品中得到系统更正，而译名的精确对音，又对其释义至关重要。在收录于《西域图志》卷首的御制《西域地名考证叙概》一文中，乾隆帝即记载了一段亲历的对音往事：

> 初征噶尔丹时，有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者来降，称其地为叶尔钦、哈斯噶尔……乙亥兴师以来，执讯获丑，屡询其人，称为叶尔奇木、哈什哈尔。今则二城之人住京师者有之，细询其音，乃定为叶尔羌、喀什噶尔。盖回语谓地为叶尔，宽为羌，谓各色为喀什，谓砖房为噶尔。合而言之，则叶尔羌者，地宽也；喀什噶尔者，各色砖房也。[⑥]

乾隆帝在叙述中将对音准确性与交往程度相联系，显有夸耀武功之意。然而欲记录区分“哈斯噶尔”“哈什哈尔”“喀什噶尔”间的微妙差异，亦有赖于精确的对音体系。而对音的审定，无疑是进行“各色为喀什”“砖房为噶尔”等词义训释的前提基础。

正是在此意义上，精确对音为译语考证提供了新的可能。如《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多以索伦语正《辽史》、满语正《金史》、蒙语正《元史》，即为对音考证之典型。[⑦] 以《钦定辽史语解》卷一“安巴坚”条为例，满文作 amba giyan，正文云：“满洲语安巴，大也；坚，理也。卷一作阿保机，太祖字。”[⑧] 盖以满语对音“安巴坚”订正《辽史》之“阿保机”，并解其义为“大理”，可备一说。又如戴震为小学大家，其《水地记》亦于西域译名多有称引。起首论及河源“巴颜哈喇”山，即以译名与实地互证：“其色紫黑，产金银。番语谓黑‘哈喇’，谓富‘巴颜’，故纳斯称。”而这一释义，又与《唐书·吐蕃传》所记河源一带“紫山”之名相合，遂得考证史传之所指。[⑨] 有关乾隆朝多语文辞书地志的编纂与西北史地学兴起的关系，马子木已有精彩论

---

① 《钦定西域同文志》卷 6,《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 183 册，世界书局，1985 年，第 129–130 页。

② 《增订清文鉴》卷首完整列出了满文十二字头与“三合切音”相对应的具体形式。有关“三合切音”在乾隆朝的发展过程，参见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pp.156–162。

③ 值得一提的是，在 17 世纪的汉语音韵学内部，已有将二字切音进一步拆解为三字的倾向。晚明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首倡“三音合切”之法，清初赵绍箕《拙庵韵悟》更根据字音的发端、承转与收煞，以“呼”“应”“吸”三分撰成整套韵图。不过此类三切法主要着眼于汉字复韵母、鼻韵母的拆解，与作为普遍记音方式的“三合切音”尚不可同日而语。参见沈宠绥：《度曲须知》上卷《字母堪删》，明崇祯刻本，第 32a 页–36b 页；赵绍箕：《拙庵韵悟·十要》，康熙五十五年抄本，国家图书馆藏。

④ 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 21 册《答李子德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27 页。

⑤ 《钦定西域同文志》凡例，第 10 页；卷 1，第 16 页。

⑥ 《钦定皇朝西域图志》卷首 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00 册，第 42–43 页。

⑦ 《钦定辽史语解》卷首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96 册，第 2 页。

⑧ 《钦定辽史语解》卷 1，第 4 页。

⑨ 戴震：《水地记》,《戴震全书》第 4 册，2010 年，第 423 页。

述。[①] 译名的订音释义，则是这一学术走向背后的重要动力。

不过，若论对音体系与古音体系的相似之处，其关键尚不在一时一地之考证，在更为广泛的方法论层面，二者也以类似方式重新定义了声音与文字的关系。《同文韵统》在比较汉、藏字母时，即对其系连思路有精到之总结："虽语言文字，闻见迥殊，要以逐字寻声，因声考字，字虽异制，声实同元。"[②] 精密对音的构建，使声音成为沟通方域语言的枢纽，而在方法论上拥有了对文字的优先性。这一关系在乾隆帝御制《鄂博说》一文中得到精彩展现：

> 昨命直隶总督方观承考滦河濡水之源……其中有"濡经察汗峨軷"之语，引郑氏及《诗·大雅》之言，以证为軷祭行路神之义，则失之远矣。夫"峨"为"我"平声，非"鄂"音；而"軷"则音"拔"，与"博"韵更吴越不同。徒以石之嵯峨及軷祭取义，实曲为穿凿矣。夫"鄂博"，乃蒙古语，为堆砌之义，堆砌石以表祭处。蒙古固不知《大雅》及郑氏之说也。即"鄂博"字略近，亦不过对音书之，有何取义于其间哉！[③]

方观承（1698—1768）将"峨軷"一词解为"石之嵯峨及軷祭"，显系对音汉字的字面解读。查《大雅·生民》，有"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之句；《周礼》大驭掌"犯軷"，郑玄注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为神主，既祭之，以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难也。"[④] 所谓"引郑氏及《诗·大雅》之言，以证为軷祭行路神之义"，或即以此二条为所据。尽管这一解读展现了方氏对经典文本的熟稔，却不免"失之远矣"，因为蒙古"固不知《大雅》及郑氏之说"，引证愈繁，则穿凿愈甚。未得确解的直接原因，在于对音有失。"峨軷"，即今所谓"敖包"（满语：obo；蒙语 oboγa），依对音字法，当以"鄂博"为准，而峨、軷二字元音皆未得之。[⑤] 但穿凿的根本原因，则在方氏自对音汉字取义，流于文字表象，而未能遵循"因声考字"的原则。在乾隆帝御制作品中，此例曾被多次引用，作为"以字文强索其义"的典型，其结果只能是"求其义而不得，遂并其音而失之"。[⑥] 为阐明这一字面解读的荒谬性，乾隆帝还在《增订清文鉴》御制序中不无风趣地自创一例："且以汉文'天'字，设用国书合音，则字当云'梯烟'。夫'梯烟'宁有义乎？岂'梯'必梯磴之梯，而'烟'必烟霄之烟乎？穿凿者又将谬解为'梯烟而上'，为'天'之义可乎？"[⑦]

值得注意的是，"因声求义"非但是对音考证的基本方法，亦是以古音考证为核心的乾嘉小学的指导原则。王引之《经义述闻》开篇即云："诂训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籀为病矣。"[⑧] 古音体系联结今古二音，正如对音体系沟通主客二语。在此，王氏亦将训释方法分为字面与声音两种。如依字面强解，则"诘籀为病"；如能循古音"读以本字"，便会"涣然冰释"。一正一反，与乾隆帝所言可谓如出一辙。有关乾嘉学者如何通过辨析古音假借，突破以字面征引为代表的晚明学术，笔者已有专门讨论。[⑨] 以上例证则进一步说明，无论是古音还是

---

① 马子木：《清朝西进与 17–18 世纪士人的地理知识世界》，《中华文史论丛》2018 年第 3 期。

② 《钦定同文韵统》卷 6《华梵字母合璧说》，第 3a 页。

③ 弘历：《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 10 册《鄂博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17 页。

④ 《毛诗传笺》卷 17，中华书局，2018 年，第 384 页；《周礼注疏》卷 3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853 页。

⑤ 《西域同文志》载有青海同名地名 cagan obo，汉字对音即作"察罕鄂博"。注云："蒙古语。察罕，白色；鄂博，垒石也。"与《鄂博说》相符。《钦定西域同文志》卷 14，第 266 页。

⑥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首御制序，《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 83 册，第 4–5 页；弘历：《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 10 册《滦河濡水源考证》，第 721 页。

⑦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首御制序，第 5–6 页。

⑧ 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中华书局，2021 年，第 2 页。

⑨ Yingtian He, "Well-Ordered Textures: The *Book of Odes* and the Study of *Wu* in Mid-Qing China,"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23, chapter 3.

对音系统，其精密化皆能使文本对象呈现出字面之下的深层结构。对小学考证而言，这体现为依假借关系推定本字；对译语考证而言，则是据方域语言还音定名。这一深层面向超越了文字的表面解释，而为时间性与空间性考证所共有，成为乾嘉学术发明新解、超逸前人的基础所在。

（三）义项的空间与时间性系连

古音与对音系统的精密化，在乾嘉学术语境下确立了“声音”对“文字”的优先性。然而熟谙多种语言的乾隆帝敏锐意识到，即便是处于基础地位的“声音”，在本质上仍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西域同文志》一书，确有将满文作为一般表音符号的意图。但乾隆帝在其御制序中表达的“同文”理念，尚有超越“声音”之处：

> 尝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谓实也。至于文，盖其名耳。实无不同，文则或有殊矣。今以汉语指天，则曰“天”；以国语指天，则曰“阿卜嗒”；以蒙古语、准语指天，则曰“腾格里”；以西番语指天，则曰“那木喀”；以回语指天，则曰“阿思满”。令回人指天，以告汉人曰：“此阿思满。”汉人必以为非。汉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则回人亦必以为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讵知孰之为是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汉人以为天而敬之，回人以为阿思满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实既同，名亦无不同焉。①

柄谷行人曾指出，“专名”是跨越不同可能世界的“固定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其内涵无法被现实世界的限定性描述所穷尽。这种丰富性内在于专名所指涉的对象自身，而外在于身处现实世界的语言使用者。② 与之类似，作为基本义项的“天”跨越多个语言世界，在“仰首以望”中被共同指涉，却无法为特定语言所穷尽。如果将时空维度下的多元语言世界与柄谷的“可能世界”相类比，那么对于身处特定语言空间中的考证学者而言，名物义项亦以类似方式展现出一种丰富的内向深度；它在方域语言的交流中呈露，以精确对音为媒介，而以共同指涉为依托。这一围绕基本义项展开的多语文格局，所重不在名象的齐同，而在实指的相通，不仅为“同文”这一概念带来了新的诠释，也奠定了空间性考证的认识论基础。

如果将语言的历时流变置于“时间性翻译”的视角下，汉语的孳乳演化亦将呈现出类似的认识论格局。在时间维度下以义项串联词汇，首推《尔雅》以降的雅学传统。如清末刘师培所言：

> 上古之时，一义仅有一字，一物仅有一名。后因方音不同，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义同而形不同者，音必相近，在古代亦只为一字。试观《尔雅·释诂》诸篇，于字之一义数字者，互相训释，即为转注之公例，然音皆相近……盖《释诂》一篇，以今语证古语者也。若《释言》一篇，则以方言证雅言，其例亦与《释诂》同。③

《尔雅》各条目自身，即体现了上古文字孳乳流变的过程。尽管一义一字、一物一名的论断不免失之理想，但历代方音围绕同一义项转注互训，却是极具见地的观察。后世的雅学训释，即可视为这一过程在时间上的延续，而语言在时间维度的多元流变，亦使雅学义项展现出与多语言义项类似的内向深度。这一内在性以古音系统为媒介，围绕经典文本中的名物语汇而呈露，亦为时间性考据提供了相应的认识论基础。正是通过以上方式，经典义项在文本时空中呈现为具有内在性的“物”，而使基于古音与对音的深入考证成为可能。江南学者王初桐（1730—1821）曾撰有《演雅》一书，以义项为单位，在各条目下将《尔雅》《说文》以降的异字别名与自东洋至西域的诸方译语并列系联，正展现出时间性训释与空间性译语的连贯性，以及由二者所共同

① 《钦定西域同文志》御制序，第 1–2 页。

② 柄谷行人著：《探究（二）》，王钦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21–22、43–44、50–52 页。

③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仪征刘申叔遗书》第 3 册，广陵书社，2021 年，第 1261–1262 页。

构建的乾嘉考证格局。①

四、结语

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皇朝通志·七音略》曾从六个方面概述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其一为满文十二字头的“天地元音论”，其二为《清文鉴》《音韵阐微》等书对满汉切音的改良，其三为《增订清文鉴》所设三合切音，其四为《同文韵统》《西域同文志》等作的多语言对音互证，其五为《音韵述微》等作对汉字改良反切的继承，其六为顾炎武《古音表》、江永《古韵标准》等“本朝诸臣讲求音韵之书”。六者依次排列，盛清“大一统”格局下的音韵学规模也就和盘而出：

> 谨将国书十二字头首载简端，及经典梵音以至遐方别部与国书音韵互为援证者，次及华音，次及诸臣著述。提纲举要，缀其大凡，用以征前古未备之音，以昭同文之盛。②

首“国书”、末“华音”的列举顺序，彰显了当日官方的语言意识形态。宫廷学术的视角，亦使其略于诸臣之书而详于钦定之作。但“遐方别部”的译语互证与“本朝诸臣”的华音著述，一以昭同文之盛，一以征前古之音，却集中呈现了当日音韵学在时间性与空间性上的双重延展，以及二者之间的一贯性。诚然，沟通今古的“古音系统”，乃江南学者之所长；联结方域的“对音系统”，则为宫廷学术之特色。但正如本文所示，二者并非相互独立的学术脉络，而是在方法论、认识论等层面密切关联，共同构建了考证对象的丰富义涵。在这个意义上，乾嘉考证是士人与宫廷、经典传统与方域交流的共同产物。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虽从“两种翻译”出发，主要着眼于文本考证，但其所揭示的时空架构并不局限于语言文字领域，而是同样体现在实物对象的考证之中。如乾隆帝通过比较吉林、木兰围场与南苑鹿角脱落的季节差异，订正了《礼记·月令》中有关“麋角解”的物候记载；③王念孙在参撰《钦定河源纪略》时根据实地探测的河源水色推断黄河伏流的存在，以印证《汉书》中的重源之说。④此类案例，不一而足。又如在 18 世纪由梅文鼎等人所提出的“西学中源说”，以西洋历算为周代畴人子弟西迁累世增修的结果，而与《周髀算经》互证。⑤此种论述固然不乏文化本位论的成分，但部分欧洲传教士也同样参与到其构建之中。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便将在法国新近出现的热气球飞行与早期文本中神农、黄帝飞升的记载相联系。可见在中西学术源流的论争背后，仍然存在着以方域知识印证早期智慧的共同思路。⑥事实上，晚清胡垣在遍举西方字母以印证音韵通例时，正是以历算领域的源流论述为参照：

> 秦火之时，儒生潜逃，惟西方无海阻，故宣城梅氏谓西人算学得中国六艺之真传，有由来也。今既辑中国方音，因举西方乾竺、天方、欧罗所传之字书方音，并陈其梗概焉。⑦

音学与算学的类比，凸显出文本经典与实物技术所共同遵循的时空架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显现、延展与相互转换，既是清代学术规模得以奠定的基础，也是理解乾嘉考证方法论突破与认识论形态的关键所在。

---

① 有关该书体例与成书方式，参见拙文《同文共义：王初桐〈演雅〉与乾嘉学术的多语文时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

② 《清朝通志》卷 14《七音略一》。

③ 弘历：《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 10 册《鹿角记》《麋角解说》，第 372、617 页。

④ 王念孙：《河源纪略》卷 22，《高邮二王合集》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822−823 页。

⑤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72−177.

⑥ Alexander Statman, *A Global Enlightenment: Western Progress and Chinese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pp. 97−101, 139−143.

⑦ 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0 辑第 2 册，第 692 页。

References

Elman, Benjamin A.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aarela, Mårten Söderblom.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Vedal, Nathan. *The Culture of Language in Ming China: Sound, Script,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Wang Dongjie. "Hanyu shi yi zhong yuyan: Zhongguo xiandai guoyu yundong yu hanyu 'fangyan' de chengli" ("Han language is one type of languag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Xueshu yuekan* (Academic Monthly) 11 (2015).

Phil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Regional Expressions: Time and Space in the Evidential Studies of Qing Dynasty

HE Yingt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heyingtian@tsinghua.edu.c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tial studies in the Qing dynasty encompassed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This is suggested not only from method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sounds and scripts, but also from its regional expansion across multiple ethnic and linguistic boundaries.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egional pronunciations and ancient sounds, as well as between dialectal usages and classical exegesis, within the study of *Regional Expressions* (*Fangyan*). It then broadens the scope of inquiry to incorporate multiple regional languages within the Qing context of "script commonization" (*tongwen*). Focusing on multilingual court compilations and particularly the matching of sounds, this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temporal-spatial relationships in translingual evidential studies. The "sound-matching system" across geographical regions exhibits substantial method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similarity with the "ancient phonological system" that was typical for bridging the philological gap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Under the shared approach of "seeking meaning through sound," the text unveiled an intrinsic depth which enabled precise evidential investigation—an interiority resulting from both time and space, exegetical tradition and transregional connections.

Keywords: evidential studies, regional expressions, *tongwen*, temporal-spatial relationship